

#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中国政党制度的嬗变逻辑 ——基于政治发展的分析视角

黄恩华, 张师平

(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社会样态变迁以及现代国家构建,中国政党制度经历不断的变化、调整与完善。政党政治取代皇权、军权政治是历史的必然;合作型政党政治取代竞争型、垄断型政党政治同样是历史的必然;在政党合作基本框架下,唯有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走上社会主义政党政治道路,并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型政党制度,才有挽救民族危亡、获得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可能。百年来中国政党制度嬗变演进的最根本经验与启示是必须切实坚持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党制度百年嬗变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决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行稳致远、不断完善发展的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百年;政党制度;政党政治;多党合作;党的领导

**中图分类号:** D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21)01-0018-07

## The Evolutional Logic of China's Political Party System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HUANG Enhua, ZHANG Shipi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00 years ago,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social chang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country, China's political party system has experienced constant changes, adjustments and improvements. It is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that party politics replaces imperial power and military power politics. It is also inevitable that the cooperative political party politics will replace the competitive and monopoly political party politics. Under the basic framework of party cooperation, only by choosing multi-party cooper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aking the road of socialist party politics, and establishing a new party system corresponding to it, can we save the nation from danger, obtain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people's liberation, and then realize the greatest possibility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refore, the most fundament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收稿日期: 2020-11-10

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实践经验总结课题“井冈山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研究”(编号: 2020MSJ014);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势及路径研究”(编号: 20ZZ04)

作者简介: 黄恩华(1962-),男,江西临川人,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张师平(1988-),男,江西抚州人,江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is that we must earnestly adhere to and perfect the new Chines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As a decisive force in the 100 years evolu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party system and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the CPC determines that the key to the stead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lies in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PC.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00 years; party system; party politics; multi-party cooperation;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政治发展理论是当代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支和分析范式。政治发展是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sup>[1] (P375)</sup> 它主要研究政治系统以内的各种变化,研究政治系统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变迁,或特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政治领域发生的变化。<sup>[2] (P1)</sup> 政治发展过程的核心即是从非民主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变迁过程。从政治发展的分析视角来看,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移植,进而取代皇权政治、军权政治是历史的必然,由此肇始中国政党制度的探索之路;合作型政党政治取代竞争型、垄断型政党政治也是历史的必然,由此构建起中国政党制度的框架基础;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才是中国政党制度行稳致远的必由之路,由此完成了中国政党制度的最终形塑。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中国政党制度的演进历程,体现出的嬗变逻辑和形成的多样互动样态与价值启示,无不揭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也无不昭示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唯有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不断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 一、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移植:肇始中国政党制度的探索之路

20世纪伊始,大清帝国摇摇欲坠,但晚清政府并不想退出历史舞台,还幻想主导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并为此做出一系列变革,实施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旨在推动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清末新政。在新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在晚清政治舞台上颇有生气、表现极为活跃的立宪派,他们希冀通过晚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促使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近代中国政党政治就肇始于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运动。尔后改良派中也有一部分人士迎合晚清政府的主张,倡导实施君主立宪。即使在辛亥革命后,君主立宪势力仍有延续,一直延续到梁启超发起成立的进步党时期,后来随洪宪帝制破产,皇权主导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才被彻底丢弃。皇权政治退出历史舞台后,中国大地无论中央层面还是地方上均出现了另外一种势力,即大大小小的军阀。握有军权的北洋军阀集团,以暴力为手段,控制全国的局面,但是却极大限制政治参与,更无法承担起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因此只有暂时的替代作用。<sup>[3]</sup> 之后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点,军权试图主导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道路根本行不通。

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中国近代历史已然昭示了:皇权不能代表民权的时候,皇权政治会退出历史舞台,军权压制民权的时候,军权政治也会最终败北。最后,真正能够改变中国政治发展轨迹,能对中国现代政治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唯有政党和政党政治,因为“在现代政治中,政党是主导性的政治力量”,<sup>[4] (P1)</sup>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运作方式”。<sup>[5]</sup> 由此,移植西方政党政治,成为当时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社会所争论的主要不是政党应不应该存在的问题,而是政党的合适数量与采用政党政治的模式问题。整个民国时期,政党在政治舞台上都相当活跃,先后出现过几次政党组建与活动的高潮,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党制度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sup>[6] (P52)</sup> 但此后政党政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民国初年尝试实行多党制而发生多党乱象境遇,“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一时间政党数量达三百之众,但大多如过往烟云,旋生旋灭,并未对现代政党政治产生多大推进作用,反而乱象丛生、败坏政治生态。正如亨廷顿所言,“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

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sup>[7] (P350)</sup>至宋教仁案发生、袁世凯取缔国民党合法政党资格和解散国会,民国初年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昙花一现,走向终结。

从皇权政治到军权政治,再到后来以政党政治为主导,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发展变迁的历史已然揭示了唯有政党政治道路才是推进政治良性发展的正道。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才正式开启了对国家层面政党制度的艰难摸索和逐步构建,因为政党政治是政党制度的基础,政党制度是政党政治的核心内容。但现实政治发展并非单向的线性因果链条,而是一个多重因素彼此渗透、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历史也已说明,在未完成国家根本改造的前提下,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专制统治者压根儿就不需要什么“政党政治”,不光多党制、两党制不需要,甚至连一党制也看不上,政党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一个玩物,只为蛊惑人心、争取舆论支持,而假借“政党政治”外衣,达到民主假象之目的,这样形成的政党政治自然难以发挥应有功效,也不可能使中国走上正确的政党政治道路。由此,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特别是严密组织起来的政党推动政治发展”,<sup>[2] (P11)</sup>而能够堪此大任的就只有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和转折点,在此后的政治实践中,在坚定政党政治正途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调适和扭转政党政治发展走向,将之逐步引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轨道,使之适应我国政治发展的实际需求。

## 二、选择合作型的政党政治形态:构建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框架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拒绝跟任何非无产阶级政党开展合作。在党的一大决议中明确规定,“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对现存各政党采取“攻击和排斥”的态度。<sup>[8] (P8)</sup>这固然与初生的共产党对当时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有关。很快党的二大就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sup>[9] (P139)</sup>并为此付诸实际行动。短短一年之内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如此重大转变绝非偶然,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革命任务非常艰巨,斗争形势所迫需要联合其他民主的革命势力,加之共产党自身的弱小,工人阶级数量少,斗争力量不足等等,加强团结合作势在必行。中国共产党由反对政党合作到主张政党合作,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变,也由此开启了以政党之间合作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合作型政党制度的探索与建设之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起,中国政治舞台上就逐步形成了近现代中国政党格局下的三种类型政党,即从1927年起快速蜕变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国民党,始终不渝地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主要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与愿望的各民主党派。<sup>[10] (P67)</sup>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所实践的政党合作也就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各民主党派的合作。

大革命情势风起云涌之际,新生的共产党首先选择的合作对象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sup>[11] (P147)</sup>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开启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初次合作,建立起革命统一战线,革命力量迅即得以增强,很快掀起全国革命高潮。1924年至1927年的短暂时间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sup>[12] (P364)</sup>革命政党合作带来的巨大威力,似乎预示着中国将在革命胜利后走上“两党制”的道路,但革命形势发展转瞬即变。孙中山逝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集团背离“三大政策”、背叛革命,日益转为反动,公然“清党”“分共”,对共产党人实行血腥屠杀,致使国共两党合作最终破裂。因此严格来讲,这不是革命斗争的一种稳定的政党合作体制,而是一种特殊的可变的政党组合方式。<sup>[13]</sup>但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关系的形成建立及最终彻底破产,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为在中国社会建立一种新型政党关系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另外,国共合作关系的彻底破裂,为中国民主党派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政治空间。尔后,国民党执政时期,在“一党建国”的组党理念和制度安排下,国民革命的三阶段理论的主体就是国民党,军政则成为“以党建国”,训政则成为“以党治国”,只有到宪政时期,才是“还政于民”时期。<sup>[14]</sup>蒋介石乘势提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堂而皇之地推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反动独裁统治,大肆

屠杀共产党人、中间党派和其他进步分子,破坏和延滞中国民主进程。虽有国共“两党合作制”的孕育,但终究半途流产、无果而终。

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等为主体而构成的民主党派,从诞生之日起即有着强烈的反帝、爱国、追求民主的政治愿望和要求。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际,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联合各民主党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历史境遇下,国共两党转向党外合作形式重启第二次合作,各民主党派围绕抗日救亡展开积极斗争。通过抗战时期的国共遇事协商、召开国民参政会、民主宪政运动以及战后初期的国共谈判、召开多党政治协商会议等形式来共商国是,形成了一定程度上不时出现的国民党执政条件下的多党合作局面。<sup>[15]</sup>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为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对于多党合作政策时进时退,最后竟公然撕毁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一意孤行,自绝于人民之外,“始终不愿意承认其他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sup>[16]</sup>在国家政治架构层面顽固执行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因此,蒋介石统治时期随“一党制”建立而出现的垄断型政党政治,实际上沦为了军权的工具,所标榜的宪政民主终究不是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正道。

中国共产党自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和国民党合作也罢、对抗也罢,和其他中间党派的合作也好、联合也好,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各方都是朝着政党政治的方向去前行的,改变了先前皇权政治、军权政治交错,并且试图调适政治发展方向的格局,也即把中国政治发展大的格局扭转过来,进而朝着政党政治的道路前进。然而,彼时的中国政党政治依然存有不同的模式之争,有的是在国家既定的框架内去运转,仿照西方模式走上议会制民主道路,民盟等中间党派所追求的就是那一套,但是中国共产党再次改变了、跳出了那种西方式的宪政模式,同时也摆脱了苏联那种“一党制”模式,并一以贯之地实行与民主党派合作的政策。毛泽东于延安时期就明确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力。”<sup>[17] (P809)</sup>明确表明既要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又要实行民主联合。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各党派、团体在经受国民党残酷迫害和分化瓦解后,由全面抗战之初对国民党寄予厚望,到把实现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彼此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相互支持,一道坚持抗战、维护团结、推动民主,形成了遇事相互协商的传统,在组织上渐渐联合、发展与壮大,在政治上一步步走向成熟,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也由此开启了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紧密团结合作为主要特征的新型政党合作关系形态。

### 三、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完成中国政党制度的最终形塑

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既与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展开坚决斗争,也没有照搬照抄苏联一党制模式,而是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着眼实际对中国政党制度进行探索和构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80%以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最强大的社会变革力量存在于广大农村,谁能把亿万贫苦农民发动起来,谁就能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领导者。<sup>[2] (P53)</sup>所以,中国要完成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就必须寻求推进政治发展的新动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工农联盟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在为民族求独立和复兴、为人民谋解放和幸福的过程中,担负起了主导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历史重任,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采取了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与各民主党派由刚开始的相互同情、相互支持,到逐步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并通过团结民主党派,成功团结争取了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及其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广泛地建立了同盟军,壮大了中国革命的进步力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也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艰苦卓绝的实践中,确立了在全国各种进步政治力量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在长期政治实践中,经过反复的比较,由刚开始的徘徊、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到最后郑重选择跟中国共产党走,并在人民解放战争行将胜利之际,相继发声公开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自觉自愿接受共产党领导,“近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从此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由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sup>[18]</sup>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

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sup>[19]</sup>

基于中国近现代政党关系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得到了民主党派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当代中国合作型政治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实践场域。<sup>[20]</sup>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反对一党制,同时阐明所要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他说“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sup>[17] (P1062)</sup>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多党合作的政治实践,这就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sup>[21] (P1437)</sup>以此进一步奠定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思想基础。因此,中国的政党制度经过不断创造新因素、淘汰旧因素的扬弃过程、合成过程,其内在结构最终转型为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sup>[15]</sup>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召开,颁布了代行临时宪法功能的《共同纲领》,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正式确立,翻开了我国政治发展的崭新篇章。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于民主革命时期的团结合作,是为多党合作的重要历史尝试,随着这种合作关系的形成、建立和稳固,才有可能逐步上升为一种制度,并在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固化下来,使多党合作制度成为自新中国成立伊始便构建和确立起来的第一个基本政治制度。历经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探索与实践,日渐形成一套系统完备且行之有效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体系。

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处理政党关系的指针,<sup>[22] (P635)</sup>“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sup>[12] (P526)</sup>并在党的八大上正式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即使“文革”期间,多党合作陷入低谷,民主党派遭受磨难,但“绝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政治考验,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sup>[23] (P204)</sup>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各民主党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sup>[23] (P186)</sup>的事实判断,充分肯定民主党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科学阐明多党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并在党的十二大上将“八字方针”扩展成“十六字方针”,增加“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八字,以此作为新时期处理党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为民主党派充分实现政党功能和履行职责提供了舞台和空间,有力推动了新型政党关系和政党制度的重塑与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阐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显著特征和优越性,提出衡量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标准,将多党合作制度纳入宪法规制之中,保障新型政党关系和政党制度永续发展。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建设社会政治文明的战略高度,推进多党合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极其重视多党合作和政党制度建设,围绕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断推进多党合作制度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多党合作走向法治化。为此,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断,强调要把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作用作为释放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重要着力点,强调要建设高素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强调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增强责任和担当,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并就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等提出具体要求,这为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展现新作为实现新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政治舞

台。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稳步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在建立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一过程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即是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政治领导对于新型政党关系和谐发展和多党合作制度发展完善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最大优势和根本特征。

#### 四、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是百年中国政党制度嬗变的根本经验和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sup>[24] [P36]</sup>具体到政党制度同样如此,“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由该国国情、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sup>[25] [P1]</sup>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民族富强的历史,是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民主主义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总体性过程。回顾百年中国政党制度发展演进历史,从以服务于“国家统一”“民族独立”斗争需要的政党关系实践,到以“领导”“合作”和“协商”为特质的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如果说,在20世纪初国人的基本认识是“非政党政治不可挽救中国”;20世纪中叶,人民政权建立给出的基本回答是“非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不可发展中国”;那么今天,我们得出的历史结论就是:只有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sup>[26]</sup>由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产物,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参与和主导下,在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社会大背景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百年中国政党制度嬗变的最根本经验和启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形成、确立到发展、完善再到趋于成熟,离不开中国革命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国家建构的宏阔实践,越来越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大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在世界政党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类型学意义”。<sup>[27]</sup>我们要倍加珍惜这一伟大的政治创造,切实坚持好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并且树立起对新型政党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信。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如何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作用在国家治理中的实际展现,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日益制度化的中国,未来中国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合理建构和发展,将越来越取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开发和建设。<sup>[28] [P131]</sup>立足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实践,站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当口,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新要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我们要以坚定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指导为基础,以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为指向,以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为依归,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完善和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政党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牺牲,中国人民就无法打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反动派,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团结统一、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向繁荣富强。”<sup>[29]</sup>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执政党,是中国政党制度百年嬗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必是完善和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决定性力量。现有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均显示,中国现代政治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政党中心主义”特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要素和根本特征。<sup>[30] [P5]</sup>共产党主导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需要政党主导,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政治逻辑。<sup>[28] [P110]</sup>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经历曲折探索,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成功探索出一条合乎我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确立了与我国文化传统、革命和建设实践、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找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路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深刻影响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走向,坚定了近代中国沿着政党政治道路前进的步伐,“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中国缘起的决定性因素”,<sup>[26]</sup>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主导力量只能

是中国共产党。为此,中国共产党应“积极应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形势和要求,遵循执政党建设和发展规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生活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不断实现执政合法性和有效性、执政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有机结合”,<sup>[10](P285-286)</sup>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经得起各种风险考验,其完善和发展能有不竭的动力和永续的政治保障。

#### 参考文献:

-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2]关海庭.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3]罗浩轩.近代中国政党制度历史嬗变的政治秩序——基于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56-62.
- [4]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5]宋涛.建立新型政党关系 建设更加美好世界[J].当代世界,2018(1):1.
- [6]李金河.中国政党政治研究(1905-1949)[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 [7]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0]钟德涛.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 [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3]匡萃坚.政党制度的命运与建党初期党对政党合作制的探索[J].中共党史研究,2001(4):75-79.
- [14]王建华.政党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一项基于中国情境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08-116.
- [15]周维启.中国政党制度百年演进的历史逻辑[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5):13-17.
- [16]周淑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党派关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7(6):46-52.
- [1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8]李小宁.1948: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性转折[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2):8-12.
- [19]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1(02).
- [20]徐理响.合作型政治:统一战线与政治整合的中国逻辑[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4):7-14.
- [2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 [2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政党制度[R].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 [26]王韶兴.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J].中国社会科学,2019(6):4-24+204.
- [27]龚少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西方政党制度的双重超越及其类型学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7):106-115.
- [28]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
- [2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
- [30]房宁.中国政治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余小江)